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李商隐诗选

刘学锴 余恕诚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商隐诗选

刘学锴
余恕诚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商隐诗选/(唐)李商隐著;刘学锴,余恕诚选注.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622-8

I. 李… II. ①李…②刘…③余… III. 唐诗 -
选集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62 号

责任编辑:降云

责任印制:张文芳

李商隐诗选

Li Shang Yin Shi Xuan

李商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197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2002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622-8/1·2765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李商隐是唐代后期杰出的、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尖锐地揭露了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反映了唐王朝衰颓期危机四伏的时代面貌,表现了那一时代被压抑的知识分子悲剧性的命运和心理。在诗歌艺术方面,他通过广泛学习前人,惨淡经营,突破了由盛唐和中唐诗人多方开拓而难乎为继的局面,创造了深婉精丽、富于感伤情调和象征暗示色彩的新诗风,为古代诗歌抒情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李商隐(812—858)^{〔一〕},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从祖父一代起迁居荥阳(今河南郑州)。他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这时,曾经是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繁荣的唐王朝已经趋于没落。李商隐童年时期,朝廷虽一度削平藩镇,出现过短暂的所谓“元和中兴”。但政治上的种种积弊依然存在,军事上一时的胜利并不巩固;加以宪宗以后的两个皇帝(穆宗、敬宗)特别荒淫昏愤,因而中兴局面转瞬即逝,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唐王朝进入了危

〔一〕 李商隐的生年,有冯浩的元和八年(813)说、钱振伦的元和六年(811)说、张采田的元和七年(812)说等三种主要说法。我们采用张采田说。张说详见其所著《玉谿生年谱会笺》。

机深重的后期。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急剧发展。均田制度弛以来，庄园制迅速发展，地主大量占有土地完全合法化。德宗时政论家陆贽已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一〕}其后情况更为严重。文宗开成二年冬，李商隐自兴元返长安，沿途一片荒凉破败，肥沃的关中地区，竟至“十室无一存”。由于统治集团奢侈浪费，官吏贪污成风，加以战乱频仍，军费开支浩大，唐后期赋税的苛重和名目的繁多，都达到了前代少有的程度。而庄园地主又采取隐匿田亩等手段，将大量赋税和差役转嫁到贫苦农户身上。农民走投无路，由流散逃亡，进而聚集为小股起义武装。“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这是李商隐写的长安近郊的情况，其他地区自然更为严重。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迅速加剧。在地方，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愈演愈烈，穆宗以后，一度臣服中央的河北三镇恢复割据，其它地区也先后出现一些割据与半割据者。在朝廷，宦官专权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他们掌握军权，凌驾于朝官之上，操纵着皇帝的废立生死，“威慑朝廷，势倾海内”，成为盘踞在中央政权内一股最反动的势力。与宦官擅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相伴，朝官之间也展开了长时间的党派纷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迭为进退，“是非蜂起”。上述种种矛盾，表明统治集团面临深重的危机，已经难以自救了。

李商隐就生活在唐王朝趋于衰颓没落的时代。他的家庭，

〔一〕《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从高祖一代起,都只做过县令、县尉和州郡僚佐一类地方官吏,而且曾祖、祖父都死得早,“百岁无业”、“家惟屡空”。商隐九岁时,父亲李嗣又在浙西幕府中病故。他奉丧侍母由浙西返郑州时,生活更是艰难:“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祔故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占户籍之数于东都畿甸郑州),佣书贩春。〔一〕”这种寒微处境,既使他对社会生活较早地有所体察,也促使他自幼“悬头苦学”,企图由科举进身,以“振兴家道”。当时,他跟随堂叔李某求学,这位叔父长期隐居不仕,擅长古诗文和书法。在他的熏陶下,李商隐显得幼年早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二〕”

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幕僚。从这时起,到开成二年(837),他除有一年左右依于重表叔崔戎,并在兖海观察使府作过短期幕僚外,一直追随令狐楚。令狐楚是牛党重要人物,宪宗时当过宰相。他让李商隐跟自己的儿子令狐绹等同学,亲自传授做骈文章奏的技巧。李商隐很快就青出于蓝,成为骈体四六名家。这对他诗歌创作属对的精切、用典的繁富和辞采的华美都有明显影响。

开成二年,由于令狐绹的奖誉,李商隐登进士第。但同年冬,令狐楚去世,诗人失去政治依托,不得不另谋出路。

从诗人开始步入社会到开成二年末,是他政治上依托显宦、积极为登第入仕而努力的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上通过摹仿学习前辈诗人初露风格个性的时期。本期中能确切编年的诗不多,但无论是密切结合时事的政治诗、托古讽今的咏史诗,以及抒写爱情和人生感慨的诗作,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显露出沉

〔一〕 李商隐《祭裴氏姊文》。

〔二〕 李商隐《樊南甲集序》。

郁、冷隽、感伤、绮艳等情采个性。这一时期创作的高潮阶段，是大和末、开成初。诗人围绕甘露之变所进行的创作，以强烈的义愤、深沉的忧虑和尖锐的批判精神，成为当时诗坛上唯独敢于对事变作正面反映的一批重要作品。而写于本期末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则进一步从历史与现实的全局来思考问题，是唐人政治诗中继杜甫《北征》以后内容最宏大的杰构，在诗歌思想性方面达到诗人一生创作的高峰。

开成三年春，李商隐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初审已被录取，但送中书省复审时，却被一位“中书长者”抹去了名字。这是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落选后不久，他来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下担任幕僚。王茂元喜爱商隐的才能，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他。新、旧《唐书》本传都说王茂元为李德裕所厚遇，商隐娶王氏女，因而受到李宗闵、牛僧孺一党的鄙薄和排斥。今天看来，王茂元虽未必是李德裕党，但李商隐在令狐楚死后几个月，即转依与牛党关系较为疏远的王茂元，被朋党积习很深的牛党人视为“诡薄无行”，是完全有可能的。从他的《酬别令狐补阙》诗“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之句也可看出，开成后期，他和令狐绹之间确已出现裂痕。开成四年，李商隐再应吏部试入选，在朝廷担任秘书省校书郎，但不久就被调为弘农尉，从清职沦为俗吏，这中间也不能排斥朋党势力猜忌倾轧的因素。

武宗会昌二年(842)春，李商隐再次参加吏部的书判甄拔试入选，授秘书省正字。这时，武宗倚重宰相李德裕，朝政有些起色。但不久诗人又因母丧而离职。等到服丧期满，返回秘书省时，已是会昌五年冬天。几个月后，武宗就去世了，政局和诗人的处境又一次发生显著变化。

从开成三年应宏博落选，到会昌六年武宗去世，李商隐三试吏部，两入秘书省，是他不断谋求在朝廷立足，又不断遇到种种挫折的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上由前期着重抒写对现实政治的关

切与感受,逐步向后期着重抒写个人身世遭遇和人生感喟的过渡期。这一时期,他结合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重大事件(如击回鹘、讨刘稹)和现象(如帝王迷信神仙方术),仍然写了不少政治性较强的诗,在七律与七绝的艺术表现技巧上,也有明显进展。但较之甘露之变前后,感情的强度和深度都有所减弱,而另一方面,感喟个人身世遭遇、吟咏日常生活的诗则有所增加。特别是守母丧闲居永乐(今山西芮城县)期间,不少抒写闲适生活的诗作思想与艺术都较平庸。相对而言,这在诗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个低潮阶段。

唐宣宗统治时期,先后任用善于迎合己意、“恃宠保位”〔一〕的白敏中、令狐绹为相,对武宗时抗击回鹘、废除佛教、裁汰冗官等有积极意义的措施,概加否定,对李德裕等会昌旧臣,从狭隘党派观念出发,予以贬逐迫害。政治上的弊端较前朝更多,人民的反抗也更加频繁,从川陕边境到长江中下游,不断出现农民起义武装,全国性的农民革命风暴渐渐迫近了。史称“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贤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二〕”说明大中之政比以往各朝更加腐朽。这种政治环境,对李商隐这样的落拓才人本来就是沉重的压抑,再加上对他怀有宿憾的牛党擅权,令狐绹也日益得势,他的处境变得格外困难。从大中元年到九年,他除短期在京兆府担任文字工作和在朝廷任太学博士外,绝大部分时间在桂州郑亚幕、徐州卢弘止幕、梓州柳仲郢幕做幕僚。大中五年,他的妻子王氏因病去世。仕途的失意,家庭的变故,更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居梓幕期间心情常常抑郁不舒。大中九年冬,他随柳仲郢自梓州返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不久便寂寞

〔一〕 范祖禹《唐鉴》。

〔二〕 《新唐书》卷二二五。

地去世了，年仅四十七岁。

这一时期是诗人政治上穷途抑塞、生活上漂泊天涯的时期，也是他深婉精丽、富于感伤情调和象征暗示色彩的诗风最后成熟的时期。在这十二年中，他仍然陆续写了一些政治抒情诗和针对现实政治而发的咏史诗，但占创作中最大比重的却是感喟身世遭遇、抒写抑塞苦闷的诗作。无论是写景、纪行、酬赠、咏物、怀古，都贯串或渗透身世之感和人生感慨，呈现出诗人独特的形象与个性。入川后的一些作品，更显露出颓唐的色彩。整个说来，他后期的创作虽然在艺术上更加精纯，思想感情却不像前期那样富于热力了。

李商隐一生，大体上与唐后期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同时。他的悲剧遭遇，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唐后期整个社会政治现实所造成的，但牛李党争作为当时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方面，确实曾对李商隐的政治遭遇产生过具体而深刻的影响。两党最初形成，可能与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有关，但后来在长期激烈纷争中，各自的成员都趋于复杂化，双方既有人出身科举，也有人出身世族。从思想政治倾向上看，同一集团的成员也不一致。因此无论对牛党或李党，都不宜笼统地全盘肯定或否定，而应根据各个人物的具体政治实践和两党在不同阶段的政治表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李商隐早期与牛党的令狐楚、萧浣等人关系比较密切，但属于个人私谊，主观上未必有依附牛党的意图。后来入王茂元幕，也谈不上是去牛就李。会昌年间，李党当政，李商隐并没有去因缘攀附；到大中年间，李党迭贬，他却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同情李德裕等会昌有功诸臣的政治倾向。这不仅可以从这一时期所作的《李卫公》、《旧将军》、《漫成五章》和为郑亚代拟的《会昌一品集序》等诗文中看出，而且从他追随的三位幕主（郑亚、卢弘止、柳仲郢）都是会昌年间李德裕所倚重的人物上也可得到有力的证明。李商隐没有在李党势盛时党李，反而在李

党失势遭黜的情况下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甚至“不惮牵牛妒”而追随郑亚等人,说明他还是较有操守和正义感的。过去一些研究者从某一时期的表面现象出发,说他是牛党或李党,其实并无确凿证据,更不能说明他在政治上究竟是进步还是落后,反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一个关心政治的诗人,可能不躋足于某一政治集团,但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事件却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和倾向性,而这,正是判断其政治态度的主要依据。

当然,在牛、李两党迭相进退,个人求仕乃至谋生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李商隐也暴露出庸俗卑微的弱点。就婚王氏,特别是受郑亚辟以后,他为了求得令狐绹的谅解,多次陈情表白。大中年间,他对令狐绹的庸才贵仕心存鄙薄,却又一再请求加以援引。他对李德裕在会昌朝所建功业由衷钦佩,对李的被贬深致不平,但在献牛党官僚杜棕的长诗中却违心地将李德裕当政比为“恶草当路”〔一〕。这些,都是他庸俗软弱一面的明显表现。但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对他的批评,与过去一些朋党之徒骂他“诡薄”、“背恩”,完全是两回事。

李商隐在创作上取得突出的成就,除了政治倾向比较进步外,跟他的思想比较解放也有密切关联。他早年在《上崔华州书》中说:

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是以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后来,他又在带有自况意味的《元结文集后序》中说:

〔一〕 见《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

论者徒曰次山(元结字)不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耶?

以这两段带有离经叛道倾向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儒学复古主义是不满的。他认为“道”并非儒者所独能,人们行自己的道不必强为迁就古人。古往今来千万种著作,流品本自不同,不应自甘居古人之下。责备人们“不师孔氏”,要求“学道必求古”,都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思想出现在九世纪上半叶,应该说是很进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多少突破儒家政治伦理和文艺观的束缚,写出许多大胆揭露腐朽、带有民主性的诗篇。如果将上述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开成初、大中初)与他创作的两次高潮联系起来考察,那么这些言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就更加清楚了。

二

李商隐是关心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现存的约六百首诗中,各种类型的政治诗占了六分之一^{〔一〕}。这个比重,即使与唐代以写政治诗著称的诗人相比,也是相当突出的。九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军事、政治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他都作出了反映。这些作品,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最有思想价值和认识意义的部分,也是判断其政治倾向的主要依据。

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倾轧,是唐后期政治生活的三大

〔一〕 初步统计,政治诗共有百首左右,除直接反映现实政治的篇章以外,还包括以古鉴今、托古讽今的咏史诗,以及少数词意隐约,难以指实,但大体上可肯定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发的诗篇(如《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明神》等)。

严重问题。李商隐分别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其中反映藩镇割据叛乱的诗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往往能从纵的历史发展和横的社会联系上揭示它的危害,并指出这一“疮疽”之患长期不能祛除,关键在于执政者的腐朽无能。他或者透过讨叛战争中将领冒功邀赏、擅自进退的腐败现象,揭示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腐败、朝无贤臣;或者通过“三朝事始平”的史实,指出皇帝的猜忌激成藩镇的叛乱;或者透过“送王姬”的“礼”,批评统治者极力笼络讨好藩镇的屈辱政策。对于藩镇,则或揭露其贪婪利己,妒敌好斗的特性,或指出其恃险割据、终遭覆灭的下场。把反对藩镇割据和批判朝廷政治、揭露割据者的本质与命运结合起来,使他这类诗在思致的深刻方面超过了以前的同类作品。抨击宦官乱政的作品多写于甘露之变以后朝野间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的时期。这些诗篇,愤怒揭露宦官控制朝廷、劫持皇帝、株连朝臣,制造大规模流血惨剧的罪行和践踏法纪、劫夺财货的行径,以沉痛的笔触描绘出长安内外昼号夜哭、冤鬼悲歌的凄惨恐怖景象,并由这一“天荒地变”式的重大政治事件预感到唐王朝衰颓没落的命运。他酬赠、哭吊反宦官的斗士刘蕡的一系列诗篇,把刘蕡受贬冤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皇帝昏愤的政治环境下加以叙写,把刘蕡“扶皇运”的抱负、直言敢谏的品质与其悲剧遭遇进行对照,也倾注了对宦官黑暗势力的憎恨,具有强烈政治批判色彩。对于朋党倾轧,诗人正面加以揭露的作品不多,更多的是采用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来曲折抒写自己的感愤。他将朋党势力比作狰狞阴森、纵横塞途的乱石,将朋党倾轧的局面比作“弹棋局”,发出“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的感慨。对朋党倾轧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阴谋手段和明争暗斗,诗人在《宫辞》、《宫妓》、《明神》等诗中也有微婉的托讽。

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倾轧,是和当时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分不开的。李商隐揭露封建统治

者的作品，在他的政治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虽多采取“咏史”的形式，但都针对现实，有感而发。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显示封建统治者生活上的奢侈淫佚与政治上的昏愤腐朽之间的联系。如《富平少侯》将少年袭位的君主奢靡好色的行为放在国家面临深重危机的环境下来描写，尖锐讽刺其醉生梦死，无愁而终将有愁；七绝《隋宫》将炀帝“乘兴南游”的纵欲行为和他昏愚拒谏、肆意糟塌民财民力的腐朽面目联系起来，以显示其覆亡的必然性，用意都颇深警。为了深寓警戒之意，作者往往选取历史上突出的亡国乱政的皇帝以托讽，揭露他们贪欲无穷，不顾一切后果，沉迷不悟，无视历史教训。嘲笑之尖刻，讽刺之辛辣，为古代文人政治讽刺诗中所少见。甚至连本朝皇帝唐玄宗，诗人也不留情面，不稍讳饰。《龙池》、《骊山有感》、《马嵬》等诗，往往被一些囿于封建伦理的诗评家斥为“大伤诗教”、“乖大体”、“太轻薄”，其实，这正从另一方面透露了这类诗的可贵的思想特色。

唐代后期许多皇帝迷信神仙方术，妄求长生，蠹财害民，荒废政事。诗人针对这类现象所写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地嘲讽了求仙的愚妄。《瑶池》在传说的基础上虚构出西王母盼不到穆王重来的场景，含意深长地显示了所谓神仙也不能使遇仙者逃脱死亡。“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海上》），神仙和求仙者在这里都被兜底作了批判。

在揭露上层统治集团的同时，诗人对下层的疾苦也有所反映。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描叙京畿地区在天灾人祸侵袭下荒凉残破的景象和农民无以为生、被迫为盗的情况，反映了藩镇叛乱、宦官乱政、朝廷重赋剥削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灞岸》、《即日》（小苑试春衣）、《异俗》等诗，对人民在回鹘的侵掠和酷虐政治的压迫下所受的痛苦，也流露了一定的同情。但这类作品在他的政治诗中只占少数，比起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揭露，显得远为逊色。

李商隐是政治上颇有抱负而遭遇非常不幸的诗人。他所创作的大量吟咏怀抱、感慨身世的诗歌，正是他这种悲剧性身世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晚唐腐败黑暗的政治现实的曲折反映。其中一些优秀之作，表现了他一生各个不同时期政治上积极奋发的精神和关怀国家命运的思想感情。从少年时期起，他就怀着“凌云一寸心”；以后在政治上虽屡遭挫折，仍不时吟唱出“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等具有奋发进取精神的诗句；直到凄凉的晚年，仍为抱负成虚而怅惘不已。这种思想感情，是他能够写出许多揭露黑暗、抨击腐朽的诗篇的思想基础。他的一些抒写个人困顿失意的篇什，如《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岳阳楼》（欲为平生）、《听鼓》、《风雨》等，或愤慨于没阶趋走的屈辱处境，或对妄图“覆舟”的“蛟龙”投以蔑视，或对以势凌人的权贵表示愤慨，都表现出傲兀不平之气，而不流于低徊哀吟。但由于诗人的悲剧性身世，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用悲剧的眼光和心理来看待人生、感受外物，因此，他的这类作品，基调往往比较感伤低沉，充满了忧郁悲凉的心声。尽管它们在客观上多少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压抑，并隐约透露出晚唐那样一个衰颓没落时代的面影，但其中既缺乏进步理想的光辉，也很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与抗争，反映了诗人思想感情中消极软弱的一面，难免给人们带来某些不健康的影响。

李商隐以“无题”标题的诗约二十首，除七律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一首系直接抒写“怀古思乡”之情以外〔一〕，其他各首均以男女相思离别为题材。这些作品究竟是纯粹的爱情诗还是另有寄托，研究者历来有不同看法。中国古代诗歌早有借美人香草、男女之情寄托政治遭遇的传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许多诗

〔一〕 纪昀认为这一首是“失去本题而后人题曰‘无题’者。”

人(如曹植、阮籍、陶潜、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也都有这类作品。李商隐自己也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一〕联系作者身世遭遇和大量借题抒抱、咏物寄慨之作,可以看出无题诗中确有一部分寄托的痕迹比较明显,寄意也比较清楚。如“何处哀筝随急管”一篇,借贫家老女无媒难嫁、自伤迟暮,暗寓寒士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八岁偷照镜”篇,借聪慧早熟少女的幽怨,寄托少年诗人渴求仕进而又忧虑前途的复杂心理;“照梁初有情”篇,借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不平,寓托诗人因朋党纷争牵累而遭受失意的怨愤;“重帏深下莫愁堂”、“白道萦回入暮霞”、“紫府仙人号宝灯”等篇,也大体上属于这种类型。何焯说“重帏”篇“直露本意”,这是切合实际的。另一部分无题诗,寄托的痕迹似有似无,多数和纯粹的爱情诗非常相似,如历来传诵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昨夜星辰昨夜风”、“凤尾香罗薄几重”、“来是空言去绝踪”、“飒飒东南细雨来”等篇,就大体上属于同类。它们在抒写爱情生活中的离别与间阻、期待与失望、执着与缠绵、苦闷与悲愤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抒情艺术水平。而这种悲剧性的爱情和爱情心理,又总是隐隐约约地和诗人的悲剧身世及人生体验有着某种联系。还有一些无题诗,如“长眉画了绣帘开”、“寿阳公主嫁时妆”,则明显是艳情冶游之作。因此,对无题诗,应该根据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与评价〔二〕。认为无题诗不涉寄托的,自不妨将它们作为爱情诗来理解和欣赏,但不必认为凡是主张无题诗中或有所寓托的就是穿凿附会。两种理解不妨并存。当然,抓住无题诗中只言片语,割裂艺术形象的整体,牵合政治上的具体人事加以比附指实,把

〔一〕《谢河东公和诗启》。

〔二〕作者另有不少摘篇首或诗中数字为题,而题目与诗意又不相涉之作(如《一片》、《银河吹笙》),性质类似无题,也可按上述原则处理。

它们说成是影指时事的政治诗或一律说成是向令狐绹陈情告哀之作，是违反艺术创作和鉴赏规律，也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李商隐写了大量爱情诗。其中虽然也有一些篇什受南朝宫体和中唐以来艳体诗的不良影响，写得比较靡艳，如《拟意》、《碧瓦》、《镜槛》等，但他的不少爱情诗，确实写得深情绵邈，精纯华美，充分体现了诗人善于言情的特长。这些爱情诗，有的可能和诗人的具体爱情经历有关，有特定的抒情对象；有的则可能是在诗人生活体验基础上所作的一种艺术概括和创造，未必有所谓“本事”。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也或为女性，或为男性，并不一律；主人公是女性的，身分也往往各异。其中写女冠的所占比重颇大。这和唐代道教兴盛、女子入道成为风气有关，也和诗人早岁学道玉阳的经历有关。由于诗人对宗教清规禁锢人的正常心灵有较深切的体验，这些以女冠为抒情对象的爱情诗往往能深刻揭示出她们凄清孤孑的生活处境和寂寞苦闷的内心世界，像《嫦娥》、《银河吹笙》、《重过圣女祠》等就是显例。另一些抒情对象不明的爱情诗，像《春雨》、《代赠二首》、《昨日》、《暮秋独游曲江》、《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板桥晓别》等，或抒伤离怀远之意，或写小会遽别之思，或发伤逝永隔之恨，都写得情真语挚、婉曲缠绵。它们既不像民歌中的爱情诗那样直率、大胆、热烈，也不像某些文人爱情诗那样纤佻靡艳，而是大都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凄美芳菲，具有较高的意境和品格，尽管也不无封建士大夫爱情的某些病态。

李商隐与妻子王氏伉俪情笃，诗集中有不少抒写夫妇爱情生活的诗，其中一部分是婚后商隐离家外出期间怀念王氏的诗，如《端居》、《夜意》、《风》、《摇落》等；另一部分是王氏亡故后写的悼亡诗，如《房中曲》、《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正月崇让宅》等。这两部分作品都写得情意真切深永，特别是悼亡诗，往往在沉痛的悼伤之情中织

人浓重的身世之感和对于现实环境的凄冷感受，成为悼亡诗中一个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新品种。

李商隐还写了不少咏物抒情的精美诗章。前者除个别篇章（如《微雨》）以精细地描绘刻画客观物态见长以外，绝大多数是或隐或显地象征诗人身世遭遇、寄托诗人人生体验和感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咏怀诗。像为雨所败、先期零落的牡丹，非时早秀、不与年芳的梅花，先荣后悴、在斜阳暮蝉中摇曳的衰柳，暗夜自明、风天强笑的李花，“高难饱”、“恨费声”的秋蝉，“巧啖岂能无本意”的流莺，乃至“无端五十弦”的锦瑟，无不渗透身世遭逢之感，使这些客观事物成为诗人形象、品格、命运的一种象征。在托物寓慨的自觉性和物、我的交融神合方面，李商隐可能是最突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抒情写景短章，如《夕阳楼》、《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晚晴》、《楚吟》、《过楚宫》、《乐游原》等，在表现悲剧身世、心理和人生感受方面，和上述咏物诗也是声息相通的。

将李商隐的咏怀诗、无题诗、爱情诗、咏物抒情诗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题材的篇章中，或显或隐地贯串着共同的抒情内容，这就是诗人的身世之感、人生体验与人生感慨。诗歌中抒写人生感慨，并不自李商隐始。屈、陶、李、杜等大诗人的作品中，也时有表达人生感慨的警句。但他们更大的兴趣却在整个社会现实，即使抒写人生感慨，也往往是以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感慨为前提，像李白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杜甫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等就是如此。到了李商隐诗中，表达人生感慨发展为基本主题，成为创作中一种自觉的贯串一切的要求。从李、杜的面对现实，以表达社会感受为主，到李商隐的面对自我，以表达身世之感、人生感慨为主，正反映出唐王朝由恢宏开扩到衰颓偏仄的历史趋势，也反映出封建知识分子的心态由盛世时